

戏剧研究资料 9

本期要目

- 一、回忆1943年反扫荡时的“抗敌剧社”
- 二、谈谈演员的道德与修养
- 三、为昆曲艺术贡献一生的王益友先生
- 四、话剧运用戏曲手法一例
- 五、谈“SOur”
- 六、南北谈艺录（三）尚小云的刚劲美
- 七、京剧艺术的奇葩：李慕良操琴艺术
- 八、京剧诀谚辑释（二）
- ※ 戏曲舞台常见的
单筋斗与串筋斗之运用规律及其结构

天津市文化局
戏剧研究室编

目 录

一、回忆1943年反扫荡时的“抗敌剧社”

.....何 迟 口 述

张国贤记录整理(1)

二、谈谈演员的道德与修养

(1982年9月8日在天津市
戏曲界道德课学习班的发言)

.....李英斌(18)

三、为昆曲艺术贡献一生的王益友先生

.....朱经畲(35)

四、话剧运用戏曲手法一例

.....吴同宾(40)

五、谈“Sou”

——兼谈余叔岩先生的“无字不撇”

.....欧阳中石张畴(42)

六、南北谈艺录（三）

——刚劲美——试谈尚小云的表演艺术

.....王永恒（57）

七、京剧艺术的奇葩

——试论李慕良操琴艺术

.....贺国钧

杨鹤年（62）

八、京剧诀谚辑释（二）

.....刘琦（80）

九、戏曲人物的称呼

.....李英斌（145）

十、昆曲（戏曲知识）

.....王林（151）

十一、戏曲舞台常见的

单筋斗与串筋斗之运用规律及其结构

.....张国贤

裔昆辉（154）

回 忆 1 9 4 3 年

反扫荡时的“抗敌剧社”

何 迟

口 述

张国贤

记录整理

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拼凑了七万多人的兵力，对晋察冀边区实行了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的“大扫荡”。敌人打算一举全部毁灭晋察冀边区，但是，最后却以惨败而告终。

1943年初秋，抗敌剧社驻军在河北省阜平县胭脂河西岸的一个村庄里。这个村子名叫潘庄，大约有三百几十户人家，是个依山傍水的美丽村庄。初秋时候，山上梯田里的高粱、玉米、谷子，长势很好。阜平又以产枣著名，在“扫荡”刚刚开始的时候，枣树上已经结了象指头肚大小的枣子，当然还是绿的。整个村庄，呈现着一片繁忙兴盛、欣欣向荣的景象。做为当地驻军的抗敌剧社，和当地的老百姓关系十分融洽。有些群众在晚上经常到我们宿舍里去闲谈；在白天他们休息时，也常常有不少人在场院上围着我们，看我们排戏、唱歌、跳秧歌舞。有时有一些青年人也参加到扭秧

歌的队列里，去学习和练习扭秧歌。

敌人“扫荡”一开始，抗敌剧社接到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命令，要我们迅速转移。当时抗敌剧社大致上有七十几个人，我们接到命令之后，马上进行了“坚壁清野”的工作，这就是说要把剧社的服装、道具、书籍、文稿、……等隐藏起来。找一些僻静的、不易被敌人发现的地方，挖好洞，然后把东西放进去，再把洞口堵住，盖上土，上面再移植一些青草，使敌人发觉不了，以便等到战役结束时，再取出来使用。

做好了“坚壁清野”，抗敌剧社就从潘庄村向西面的方向出发了。

我们在反“扫荡”中的任务有两个：第一，是要尽力保存我们的力量，避免在反“扫荡”中做过多的牺牲；第二，在反“扫荡”路途上，利用一切时机进行宣传工作，鼓舞群众斗志，建立我们必胜、敌人必败的信心。同时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自己。

当时我们的行军，每天至少要走七十到八十里。行军的路线都是按照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所规定的路线走的。在敌人走过去以后，跟着敌人的尾巴来走。如果敌人翻过头来的话，我们仍然是跟着敌人的行踪，走在敌人的尾巴后头。这样的走法，可以避免敌人发现我们。

我们走来走去，首先到了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地方（县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在行军的路上，七十多个人的队伍，有老年人，也有小孩子。象炊事班那些同志，一般都在四十几岁到五十来岁；最小的演员也不过十三四岁、十五六岁左右。虽然大家走得很疲劳，却没有一个人掉队。但是，七

十几个人的队伍，目标是相当大的；我们剧社又没有带什么武器，只有一个火力班配备着少数的步枪和手榴弹等轻武器，个别同志才佩带手枪和手榴弹。手榴弹有柠檬式的，也有木把式的。规格也很不统一，当我们行军时，正是敌人在冀晋交界地区疯狂肆虐的时候，敌人不仅出动陆军，而且出动了空军，陆空结合，侦察搜索。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我们不得不化整为零。

在这个时候，剧社的同志们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每个人都带着两个干粮袋，（大概有三尺半长，一寸半粗，一个里头装的是小米，一个里头装的是大麦炒面），另外还有一个二寸多长不到寸半宽的小口袋装盐。这些吃食，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动用，而且还需要有剧社社部领导的批准命令。否则谁也不准私自动用的。干粮袋之外，再加上用自己的被子、单子、棉衣、衬衣、鞋等打成的背包。每人还都有一个挂包。装着自己常用的几本书籍、洗漱用具、牙刷、牙粉等。每人的皮带上拴着一个白铁缸子，吃饭用它，喝水用它，漱口也用它。每班十几个人，带着一个截下一多半的煤油桶，洗刷干净后，上面安一个铁梁，或用绳子拴个提梁，拿它来装菜盛饭。每班每天有一个同志，轮流值日拿它到炊事班去打菜、打饭、打水。走到冀晋交界时，身上背的小米已经吃完了，后来就不得不吃炒面，等到炒面吃完时，那一小袋的盐也就吃完了。这时只好就地取粮。就地取粮就是走到哪个村庄，就用粮票从哪个村庄的村政权那里支取粮食吃。粮票交给村政权后，当地的村政权在秋收交公粮时，就可以用它来抵当应交公粮的任务数字。

我们分散活动时，分成了五六个小队。每个小队大概有

十几个人，男同志、女同志、小同志都是混合编制的。为什么编成小队呢？一来为了组织精干、便于隐蔽；二来为了到某个村庄，便于筹粮筹盐，活动起来也比较灵活方便，即或被敌人包围住，损失也比较小，突围起来也比较容易。

当时我记得有这种情况：当粮食和炒面吃完的时候，常常是拿半生不熟的棒子吃。在经过敌人已经抢掠一空的村庄时，甚至只能从老百姓被烧过的房屋里来找到群众储存烧糊的倭瓜或其他一些东西，来当食物。有时候，村里连一口锅都没有了，做菜做饭的时候怎么做呢？我们开动脑筋，发明创造：用倭瓜当锅。我们找一个最大的倭瓜，把倭瓜瓢子掏去，用几块石头垫起来，座在上头，里边灌满了水，下面点着了火，然后有什么算什么，放在里头煮。有时煮胡萝卜，有时候煮半生不熟的豆子。都是用倭瓜当锅煮了吃的。

那个时候，有很多同志是抽烟的。阜平县又是著名的产烟的地方，阜平大叶是很好抽的。所以，有的同志用自己雕刻的烟斗吸烟，一般则是用废报纸卷上烟叶来抽。可是，在行军时连粮食和盐都没有了的艰难情况下，当然也就得不到烟抽了。烟瘾较大一些的同志，如胡可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就从山坡上寻找野生植物的叶子，找那些味道近似烟味儿的代替来抽。当时我们抗敌剧社的生活，有一段就是靠吃烧焦了的倭瓜，半生的豆子，抽这样的代用烟，而且没有盐，吃的全都是淡而无味的淡饭的情况下度过来的。分散活动时，组织上派我担任小队长的职务。在我们小队里，我记得有古立高同志，车毅同志，胡可同志，唐伯涛等十几位战友。我们就在香紫窝一带活动。为了避免损失，有时候我们就不在村里边宿营，而是到山沟里去宿营。在山沟里，我们用一些

树枝乱草搭个棚子，十几个人挤在一块睡。有时下起雨来，天气很冷，大家就互相用自己的体温来温暖别人，同时也温暖着自己。很多同志常常发扬风格，自己抢着在边上睡。因为睡在边上的人最冷，而胡可同志、古立高同志就是抢着睡在边上的。我自己则由于是小队长，有时，也睡在边上。这是因为睡在门口，如遇见情况时，便于出入。我们就是这样的化整为零，今天宿营在这里，过了一天，又走几十里地宿营在另外一个地方。有时为了安全，在到达一个地点后，临时又变换地点再走出五六里地去。我们就这样进行着反“扫荡”活动。

当时，各个村庄的人是很少的。老年人、妇女、小孩子们都躲到最隐蔽的地方去了，一般的壮年又当民兵打游击去了。留下来的人就只有两三个老年干部，或者再留下几个准备给八路军当向导的人。我们为了避免给村里增添麻烦和保证安全，常是宁可住到山沟里面，也不进村庄睡觉。

我参加的这个小队是这样活动的，其他的小队也都是这样活动的。但是，就是这样的隐蔽也还是避免不了被敌人发觉。有一个小队住在山西省边缘地带的白岩村。有两支部队，都是后方机关，同时住在这个村子里。一个后方机关就是军区政治部敌工部的病号和干部家属，有些妇女还背着小孩，由敌工部部长吾必成率领，他们大概有三十几个人。当时敌人的侦察员是非常狡猾的，往往化妆成我们边区的“群众”，渗透进来侦察。当这两支后方部队头天晚上刚驻进去，第二天拂晓就被敌人包围了。枪一响，我们的这些同志立刻往外冲，进行突围。但是敌人已经占据了村庄对面的山头，这对于冲出去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大家

还是很沉着，由吾必成同志指挥着大家往外冲。这次突围，抗剧敌社牺牲了好几位同志。其中有李心广同志（李心广是一位木匠，剧团里的布景，景框子都是由他负责制作，是一个很老实，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好同志），还有一位陈易然同志（他牺牲时不过十三岁。这位小同志擅长演话剧，也能演唱歌剧，在排演京剧时也能串演京剧，如演《失空斩》时，就曾饰演过报子这个角色。他声音清脆，动作干净利索，一声“得令——”，常常能使观众鼓起掌来。他读了不少政治书籍，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同志）。另外，还有一位安玉海同志。安玉海是做总务工作的，同时也是一位不脱产的演员，而且，还参加做布景。他长得很精神，个子比较高，走起路来挺着腰板，两条腿总是向后绷着劲儿，走起来很快，显得神彩奕奕。他不管生活和战斗多么艰苦，一直是说说笑笑。安玉海同志有个特殊爱好，就是衣服上比别人多钉几颗扣子。我们军装一律钉五个扣子，而他却在对襟上钉了七个扣子。连袖口的扣子和领口的风纪扣，也钉得整整齐齐，一个不缺。安玉海同志也是一个共产党员。

此外，还有一位小同志，叫孙玉雷，突围时没有来得及突出去，他就躲到山上两块石头的夹缝里。他中了一枪，子弹是从左耳后到右眼下斜穿了一个洞，由于没有伤及脑部要害，虽然流了许多血，却忍着剧烈的疼痛，躲在石缝里避开敌人的搜索，没有被发觉。

剧社还牺牲了一位吴畏同志。他当时是一位秘密党员，约二十五六岁，曾经在这样的年龄写出几个大型话剧来，如《人去楼空》，《挑渠放水》，都是他的代表作。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抗敌剧社里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个大学生。

他不但能写剧本，而且能写论文；同时平易近人，对人和蔼可亲。

总的说来，敌人虽然用了相当多的兵力（起码一个中队以上）把白岩村两面包围，但是我们大部分同志还是突围出来了，牺牲的仍然是少部分。然而，这对于一个剧社来说，已经是很大的牺牲了。后来在敌人从这个村子撤走以后，经过两三天，我们又回到白岩村，这时孙玉雷同志才从两块石头的夹缝里走出来，他负了重伤，又挨了几天饿，但见到我们后，不但没有哭，而且还带着亲人相遇的微笑。他有多么惊人的意志力啊！孙玉雷同志现在在哪里工作，我不知道，但是他的确是一位很坚强的同志，是一位临危不惧的好同志。

这次突围，牺牲了这样几位同志，尽管遭到一些牺牲，可是我边区军民也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反“扫荡”过程中，消灭了敌军好几千人。这时我们抗敌剧社决定先汇合在香紫窝这个村庄里，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当我们集中起来时，是在离香紫窝大约三四十里地外的一个村庄里（这个村名，我给忘记了）。然后六十几位同志急行军，准备到香紫窝去集中。这时天已经冷下来了，开始下霜，草也黄了。在我们经过的地方，所有的村庄几乎都被敌人烧了，路上躺着很多死尸，地里的庄稼被敌人的马群吃掉不少，而且也糟踏了很多。屋子里偶尔有群众留下来的坛坛罐罐，里面装着的一些小米等粮食，敌人不是给掺上了砂子，就是在上边大便或者小便，糟踏得叫你不能吃下去。

我们的队伍到达香紫窝，是在下午接近黄昏时候。这个村庄后边是山，村庄对面也是山，村左还是山。这是一个座

南朝北的村子，我们是从这个村子的西边，由山沟里踩着碎石头行军到达的。这时，不仅我们全体社员，连炊事员管理员，以及剧社社部的所有领导，也都到了这个村子。进了这个村子以后，准备过上一夜，第二天马上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但是，就在我们进村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支队伍，已经隐藏在很高很高的一座山头，用望远镜往下侦察，他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进入这个村子的情况。

当我们几十位抗敌剧社的同志进入到宿营地之后，由管理员——（姓王，小名叫狗子，也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同志）和炊事员想尽一切办法，弄到一些粮食和豆子，找到一些萝卜，使同志们饱饱地吃了一顿晚饭，然后就各自回到早已分配好的房间睡觉去了。当然，在反“扫荡”期间，人们的警觉性是很高的，大家都是和衣而卧，并且戴着军帽，穿的鞋也并不脱掉。枕着背包就睡了。到了第二天，天还不亮，（也就是刚刚四点多钟的样子），由管理员炊事员用骡子在一个碾盘上碾粮食。这时天才朦朦亮，大家都等着吃完一顿早饭再出发。由于剧社化零为整，大家见面后都非常亲热，各自谈自己在反“扫荡”中的见闻。那时虽然牺牲了几位同志，但是大家的心情，对于抗日前途还是很乐观的。天还没有大亮，大家正在互相聊天，我记得我们这个房子里住有唐伯涛先生，他会唱京戏，和富连成关系很密切，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了，那时还有胡可、古立高、郑红羽等七八位同志。女同志那间房子里有胡朋、胡海珠、田华、华江、车毅，当时田华不过才十几岁，也是属于“小鬼”范围里的一位小同志。就在这时，唐伯涛正在给大家唱京戏《状元谱》，忽然枪声响了，敌人占领了村南的山头，正用排子枪向村里射击，听枪声都是三八

大盖，同时还用机枪扫射。他们的目标首先是在村边推碾子的那几位炊事员、管理员和一匹骡子。这时炊管人员赶紧把粮食扫起来，拉起骡子向后撤，抗敌剧社的火力班立刻顶上去。我记得火力班是由刘流同志率领的（刘流就是后来著名小说《烈火金钢》的作者）。然后社部的同志就指挥大家撤退。撤退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后山上的一条很窄的小路，但也被敌人用机枪给封锁了。所以在突围时只能利用敌人机枪换梭子的时间，那个时间是相当短的，不过十几秒钟。利用这个时间，几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往外突围。说也巧，就在这时忽然下起大雾来。这场大雾几乎是十步之内看不见人，我们就利用下大雾的时间，整个剧社几十位同志全部都突了出去。

出了山口有两条岔路，一条往东，一条往北。如果往北去，那就会碰上敌人，谁走了这条路就有牺牲的危险。由于敌人还没有来得及控制往东去的山头，所以往东走暂时还是安全的，这时因为情况非常紧张，社部不可能一个人一个人的指挥，所以就有往东走的，也有往北走的。大多数同志根据当时的判断，正确地估计到往东走是正确的，因此就获得了安全。如果稍一疏忽，就会往北走去。这时候抗敌剧社的指导员是刘佳同志，他是一个剧作家，又是一优秀政治指导员，他的爱人叫陈群。他们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小孩，这个孩子也就七八个月吧，起的名字是扑克牌里的“JoKer”。这时刘佳同志正指挥大家撤退，顾不上自己的孩子。当时有一位赵尚武同志，是个音乐干部，他是东北抗日联军赵尚志将军的亲兄弟，当时他不过二十几岁。赵尚武同志听到枪声以后，没有拿自己的任何东西，抢先抱起孩子就向外跑，但不幸他往北边方向走去。当敌人发现了他之后，就

集中火力向他射击。他为了保护这个小孩子，急忙用自己的身体趴在小孩的身上来进行掩护，结果在背部中了七八枪，当时就牺牲了。这时正好有一位女护士叫胡月音，这位女同志突围出去后也往北走了，她看见赵尚武同志的尸体，已经是一片血泊。这时她发现那个小孩子没有被打死，立刻抱起小孩子翻回来往东走去，所以这个小孩没有牺牲，保存下来了。这样突围出去以后，大家就往东的方向走，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集合，就这样走到晚上，天大黑时，大家又在一个村庄里见面了。见面以后，集中起来，过了一夜。在半夜里吃了一顿饭，第二天早晨又转移几十里到达另一个村庄。这时候接到了领导一个指示，叫我们往雁北敌人制造的无人区去集中。于是，我们重新集合了队伍，分了组，明确了要走的路线，但却不是集中一起走，而是分着队走。也就是说，到了无人区也要分散成小队活动，分散到无人区的各个地方去，不集中在一起。本来这条路可以走插箭岭，由插箭岭过长城到雁北，这是一条正路。可是我们不能走，因为插箭岭还被敌人占据着。我们只能顺小路走，走的都是只有山羊才能蹒跚通过的山间小路。我印象很清楚的是爬过两座大山，一座叫南坨，一座叫北坨。这两座山也不知道海拔多少公尺，都是很高的土山，偶尔才有石头露出来，野草长得很高，约七八尺左右。由于没有道路，上山是十分困难的，要揪着草，攀援而登，顺着有草的地方爬上陡峭的大山。还要照顾后边跟上来的人，把他们拉上山来。走在这么高耸的山上，我们看不见别的动物，只有黄羊。山上树是不少，但都枯死了。虽然看上去一搂多粗，可是树心已经是蛀空了，树干早已枯死，用手稍微一晃，整棵大树就倒了。有的同志为了攀登大山，

刚一扶大树，结果它就应手而倒。看起来这片地方十分荒凉，好象从来没有人走过，可以说，晋察冀边区的部队和敌人的部队谁也没有走过的。南坨和北坨的山路，是抗敌剧社同志们开拓的。过了南北坨，下起雪来。本来剧社社部给我们的命令是连夜赶到一个村庄去集合。下了这场雪后，天晴了，升起了皎洁的月亮。那一天月亮显得很大，但我们却在白茫茫的雪夜中迷了路。当时我们考虑到情况不明，路途生疏，又是半夜，如果贸然上山，最易发生危险。因为小路仅仅能通过一个人，旁边都是深渊，万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下去。为了避免无谓牺牲，我们先指派了一位同志到山上去探路，看看走法，然后再出发。于是我们就在山沟里找到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用树枝把雪扫开，决定先休息一下，等候探路的同志归来。那天天气很冷，感觉月亮好象被冻结在天上一样。虽然皓月当空，但是雪夜的山野，四顾茫茫，一望无际的银白世界，根本看不清远处哪里是树，哪里是山。大家走得十分疲劳，虽然天气酷寒，但是也把背包解下来，互相挤在一起躺了三个多小时，睡了一小觉，然后趁月亮未落，天色将明的时候，随着探路的同志继续出发上山了。

这座山是很陡的一座山，顺小路走到十几里外一个地方，遇到了社部的几位领导，丁里同志刘佳同志都已经在那里了。我的印象很清楚，那个地方叫“兔儿眼通”。那地方只有一户人家。后面的山是石头山，这户人家在石头山上挖开一个半圆形的洞，在洞前又就地取材，盖了有五尺进深的三间房，把洞口盖在里面。那个地方没有水，只有这一家有水，水源是这家屋子后边石洞里的一个缝隙，由缝里滴嗒滴嗒的滴水，这户人家就在洞下边垒了一个池子，把水一滴一

滴的储存起来，再加上他们用水十分节省，所以积累了满满的一小池子水。我们到那儿喝的就是这种清冽甘美的山泉水。并且在那儿吃了一顿饭。这户人家，我记得姓李，夫妻两个，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大的大概十四五岁，小的只有六七岁。

过了“兔儿眼通”，就到了无人区。

我们爬过了这几座山后，就一小队一小队的往雁北移动。当我们经过几个村庄——早已经是荒无人烟的残破村落，正赶上有月亮当空，惨淡的月色笼罩，连鸡叫狗咬都听不见，每座房子都是被烧过的，断瓦颓垣，没有屋顶，没有窗棂门框，显示着敌人残酷的焚烧罪行。村里的树木没有叶子，因为不是烧死就是烤死，有的烧掉了一半，有的完全烧成一根焦炭，仍在孤凄地立着。当我们在路边走时，突然跑出来几只猫，虽然个子很大，但却瘦弱不堪。猫见到我们并不害怕，只是在我们脚下穿来穿去，边走边叫，显得这儿更加凄凉悲惨。我们就是通过这样几个村庄来达到我们预计要去的地方——即被敌人从村庄赶出来没被斩尽杀绝、幸免于难而隐蔽起来的老百姓居住的地方。

老百姓们隐藏在一个山谷里，他们搭起了窝棚。窝棚的形状和大“看瓜棚”差不多，都是就地取材，用树枝搭顶，糊上泥。当地的群众对我们非常好，把仅有的一间房子的大炕腾出来，让我们居住，还供给我们粮食、菜、盐——这都是当地无人区的群众从自己嘴上节省下来供我们吃的，他们宁肯自己忍受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也要想尽办法来供我们吃饱。就是这些革命群众，在这样艰苦条件下，还在对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组织了游击队，在山头进行麻雀战；

在山沟里埋地雷，进行地雷战，涌现了不少的战斗英雄。

在这个地方，我们居住在群众的窝棚当中，挤在一条炕上，呆了不少日子。社部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保存力量，同时还要深入到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同人民打成一片，共同斗争。一路上我们所经过的地方，所看到和听到的事情，都是很激动人心的。这就构成了我们进行创作的源泉。忽然有一天，我们听到了飞机的声音，这飞机是擦着山头飞过来的。这时我们知道了敌人在撤退。敌人撤退时所走的路线，和我们住的地方仅仅是一山之隔，如果敌人发现我们，即使是上来一个班，也会给我们带来牺牲，所以在敌机飞来时，我们就都隐蔽在屋里。那时我已经打听清楚：这一带都有几条路，都是通向什么地方，以防万一发生突然事件，好突围出去。由于隐蔽得严密，敌人虽然派了飞机来侦察，也没有发现。就这样，等飞机飞走之后，直到晚上，村子里的民兵才来告诉我们：“敌人的队伍已经过完了，现在已经安全了。”从这以后，抗敌剧社就又集中起来，回到阜平县。

这次回阜平县行军的路途，就再不爬南坨、北坨，而是顺着大路小路，爬上插箭岭，经过长城。我在这一次是有生以来第一回领略了祖国万里长城的壮丽景色。在插箭岭的这一段长城，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年，还保持有六成新的颜色。登上长城一看，那山关的形势十分雄伟。但是那时我们是在抗日的征途上，是作为一名抗日的战士行军而过路的，并不是一位悠闲的旅游者去逛长城，所以并没有在长城上跑一跑，到烽火台上去看一看的闲情逸志。内心所想的只是赶紧在阜平县集中，以便迎接新的战斗。

我们到了阜平县，还是驻在原先的地方——潘庄。但是

这个村子已经被敌人糟踏得不象样子了。绝大部分枣树被锯掉了，有的是被敌人当柴禾烧了，有的是被敌人做了工事了。所以当年应该丰收的红枣都没有了。粮食也蒙受了重大损失。群众只好吃枣叶和“拿糕”——“拿糕”就是把棒子面掺上糠，放在锅里合匀了，然后放在火上做成比浆糊还要稠些的糊糊。至于枣叶的吃法，是把枣叶放在缸里，用热水激了，象激酸菜似的，激成酸味后，压上石头，过一个时期就可以吃了。当地的群众被敌人围住，没有完全跑掉，留在村里的群众，就是靠吃枣叶、糠、“拿糕”过日子的。我们原来的排练场、宿舍、和较好一些的房子，都被敌人的长官占用了。他们用老百姓的大缸做洗澡缸，还用山上的石头砌成假山。敌人的小队长住在我们的办公地点，我们回村后，还看见敌人撤退时留下来的反动宣传画和许多空罐头筒子。

敌人把这个村庄糟害的不像样子，许多在我们离村时的小姑娘，有一部分被敌人糟踏了。以前常在一起聊天的群众，和在一起扭秧歌的群众，有不少被敌人杀害了。村里群众见到我们就掉下热泪。我们心里也很难受，但是还要分散到各户去慰问，鼓励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这时候，晋察冀日报发表了一个消息：当敌人发动“扫荡”时，进攻的军队有三万人，被我们消灭的达一万几千人。敌人的损失是空前的，同时，在战斗中我方还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比如：阜平县有一个村子叫五丈湾，就出现了地雷英雄李勇。他们这个地雷组采用各种地雷战的办法配合麻雀战，有时民兵打扮成农村妇女，故意引诱敌人进入地雷网，仅李勇这一个地雷组就炸死敌人三百多。此外，还出现了神枪手李殿冰等这样受到人民敬仰和歌颂的神枪手。